

〔法〕雅克·施兰格 等著

哲学家 和他的假面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思想文库·第欧根尼文丛

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

〔法〕雅克·施兰格 等著

徐友渔 编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法)雅克·施兰格等著;徐友渔选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

(思想文库·第欧根尼文丛)

ISBN 7-80149-109-2

I. 哲… II. ①雅… ②徐…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148 号

思想文库·第欧根尼文丛

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



著 者: 雅克·施兰格 等著

编 选: 徐友渔

责任编辑: 吴伯凡

责任校对: 昆 鹏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5

字 数: 31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ISBN 7-80149-109-2/B·022

定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欧根尼文丛

总 序

第欧根尼 (Diogenes) 是古代希腊时代一位辈份很高的智者，他相信宇宙秩序由两种基本元素构成：物质的大气和形式的世界精神。宇宙中的气体因不同的地理因素而异，形式化的世界精神把气味不同的各种大气维系在一起，构成既有差异又有共契的宇宙共同生活秩序。Diogenes 自称是“一个世界公民”，不把自己所在的民族—地域共同体的大气看作最高的精神价值原则，而是把形式化的世界精神当作生活伦理的基础。希腊各城邦的现实政治利益就像大地上散发出的种种大气，只有持守形式化的世界精神，才能超越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导致的征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创办的国际性人文—社会理论学刊以 Diogenes 命名，就是要传承 Diogenes 倡导的知识人的“世界公民”精神，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利益冲突中，坚持形式的世界精神，寻求人类生活的良好秩序。在 Diogenes 时代，世界精神具有神性的形式，相应地，智者拥有的是神性的知识。现代知识人拥有的是人文—社会性知识，现代的“世界精神”是由人文—社会理论建构起来的。传统的神性知识（习传的宗教信仰）是多样的、甚至互不相融的，人文—社会理论的知识原则是形式理性的、可沟通的。Diogenes 学刊在各个具体的人文—社会理论学科和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共同的精神，既是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经济理论、人类学、地域研究

2 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

诸现代学科的汇通，又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全刊）和阿拉伯文、印地文、日文、葡萄牙文、中文（选刊）刊行。

30年代，汉语思想学术界基本上已经进入国际学术思想的共同体，一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还能与欧美学术思想的最新进展保持互动，甚至参与现代文化—社会理论的建设（比如萧公权先生的《政治多元论》和《宪政与民主》等著），并非以阐扬华夏民族文化精神为汉语知识人惟一的义不容辞的弘道之命。一群信奉“世界精神”的汉语知识人还创办了英文《中国评论周刊》，刊行十余年，成为世界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中的一员。五十年代以降，同样是在三十年代形成的走中国道路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派取得了政治文化的支配权，主张“世界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派被判定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汉语人文—社会思想和理论从此与国际学术思想共同体断绝关系，走上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独木桥。

80年代以来，汉语学术思想界中的一些知识人致力重返国际学术思想共同体。《第欧根尼》中文版刊行于1985年，就是诸多努力之一。十余年来，《第欧根尼》中文版译介了不少颇具学术思想水平的论文。可惜的是，《第欧根尼》中文版在汉语学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近年来，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论述又日渐强劲，我以为有必要也在汉语学界提倡第欧根尼精神，便提议出版《第欧根尼》中文版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将学刊中的论文分类集成，以“第欧根尼文丛”的形式出版，得到吴伯凡先生和社长谢寿光先生积极响应。我相信，《第欧根尼》学刊倡导的人文—社会理论的“世界精神”对于下一世界的汉语思想学术是必不可少的。

刘小枫

1999年5月于北京

前言 众声喧哗中的旋律

徐友渔

如果说，上一世纪的哲学地貌是几座巨峰睥睨天下、障人目光，那么 20 世纪则是奇峰、群山和起伏丘陵的连接与映衬。对许多人而言，康德和黑格尔至今仍是无法攀越的高峰，而在本世纪，我们既有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突兀怪谲的大师，又有各种等级的思想者。本世纪愈走向终点，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英雄男高音的引吭独唱已为多声部的合唱，甚至为不和谐的众声喧哗所代替。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提供一种全方位、多视角的图景。如果我们已经瞻仰过最高峰的话，那么现在不妨在群山之间乃至平原上作一番浏览，让我们看看众多哲学家对古老哲学命题的新思考，听听他们对捉摸不定的 20 世纪和人类前途的反应。

《第欧根尼文丛·哲学卷》的若干特点值得一提。首先是作者的广泛性，来自第三世界，具有不同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社会背景的哲学家显然把《第欧根尼》当成平等的、随意的讲坛。我们可以在这里听到平时在古典交响乐团听不到的曲调，其中某些旋律可能更能与我们的心灵共鸣。其次，这里的论文基本上是最近一二十年发表的，在发展速度一日千里的全球化信息时代，对新思潮、新动向的了解成了比以前更为迫切的任务。第三，这里的论文，有的出自诸如波普尔、利科这种大家的手笔，

更多的却为不那么知名的学者撰写。仰视和聆听自然使人获益匪浅，但对话和探讨亦有启迪思路、鼓舞士气之利。我在编选本卷时，既看到了中国学界整体水平与当代前沿性思考的差距，又真切地感到了对话与互补的可能性、现实性。我不能担保本卷所收全是名篇佳作，但能够保证读者阅读后可以获得与读经典不相上下的教益。

我把所选 20 篇文章归类为 6 个主题，少数情况下不无勉强的痕迹，因为作者们并不是有组织地围绕已确定的话题发言。另外，虽然我相信本书可以拓展中国读者的视野，但应记住，这里仍未反映当代哲学思潮的全貌。选编中感到局限，既有篇幅限制问题，也有候选文章质量问题，论题的重要性不能代替论文的水平。

为方便阅读，下面就各个主题的内容和背景作一点粗略的评介。

一、真理、怀疑论与解释

20 世纪是普遍怀疑的世纪，真理问题在哲学中居中心地位。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两三个世纪中，哲学的特征是信念体系的坚定与庞大，哲学家对自己经过艰苦探索的理论具有真理性坚信不疑，那么 20 世纪的哲学则笼罩在怀疑的迷雾中。这种怀疑不但是广泛的，而且是深刻的，它不但怀疑以前的各种学说，而且怀疑它们的前提：存在着真理，存在着判别真理的标准。自古希腊以来的各种关于真理的学说，到了 20 世纪都显得素朴和粗陋，都受到质疑和批判。

反独断论很有必要，但如果一味怀疑，毫无肯定，就会滑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无疑会加剧早已令人忧心忡忡的精神和

文化危机。哲学家们既对传统的独断论表示否弃，又不能接受“没有真理、没有判别真理的标准”这个结论，他们的怀疑、批判、探索新路的种种智力活动，表明了人类在本世纪面对根本存在的困惑和苦寻认识新方向的精神历程。本书选编了三篇论文，虽不全面，但也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首先向哲学家自己开刀，文章深究了人们熟视无睹的一些现象：哲学家习惯于藏匿在公共话语的后面，他们戴上假面具发言，似乎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思想、信念、直觉或感情，似乎自己是真理的传声筒。作者在分析了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观点的改变之后指出，与其说哲学理论具有真理性，不如考虑它们所引起的兴趣，它们的繁殖力、解释力和开放程度。作者的结论是，哲学家通过其著作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观点、文化、天才和梦想，是他自己的真理，而非超出个人的真理。这个结论是引人深思的，但人们不禁要问：学者的思考和研究纯属个人主观，其著作不过是人言人殊，没有真假对错及其程度之分？

如果说，《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是以一系列案例分析引导出结论，那么《真理与怀疑论》则是纯然从抽象的理论论证作出阐明。作者显然倾向于怀疑论，他从词源上考证说，在古代，怀疑是指让判断暂时悬而不决。亚里士多德对怀疑论的反驳是十分深刻、彻底的：因为表达怀疑的话语以字词具有意义为前提，这就是绝对的标准和最终的根据。但怀疑论者甚至对于人际交流是否可能都要抱怀疑态度。作者的结论是，只有预设了一套东西之后，才有关于真理的标准，主张存在真理的标准将导致无穷倒推（比如：如果标准是“是否与实际相符”，那么该标准与什么相符？）。作者提供的出路是解释学：摆脱循环的办法不属于逻辑，而属于解释的技术，应当“让逻辑学停靠到解释学的岸边”。当代解释学是古代怀疑论的继承者。直到今天，真理仍依赖于人类

利益，而人类利益无法自我证明，它随历史而变化，因此必须依靠解释。问题在于，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人类利益，难道相互冲突的利益使矛盾的主张均为真理？或者，当利益冲突靠力量解决时，我们可以说“强权即真理”？

看来，当代西方哲学中一种强有力的倾向就是从解释学的角度对待真理，当然，这出自从古代以来的对于圣经（后来扩大到对于文学作品）的解释传统。在《真理和隐喻：作为哲学和文学实践的解释》中，作者阐述了真理和隐喻之间的辩证法：我们称之为哲学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真理，而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话语方式则包含着隐喻，真理和隐喻都需要解释，解释的结构既是真的，也是隐喻性的。真理和隐喻一道构成解释的辩证法，它明确表达哲学和文学共有的解释结构。真理和隐喻构成哲学和文学的解释实践。

二、再现、游戏与规则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种实在论的真理观一直占主流地位，它认为，人们所思、所信、所说若与实在相合，则为真，否则为假。与此相应，大多数重要的哲学流派都承认这个前提：哲学是对世界的描述（不是经验的、具体的描述，而是抽象的、总体的、本质的描述）。这种传统的观点在本世纪遭到了激烈的挑战，它被说成是一种再现理论：有一个作为基础的实在，有一种对应于它的描述。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这个书名生动地反映了新潮思想对老式见解的鄙弃，再现观成了众矢之的，对它的维护或摈弃成了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

在哲学上提供最深刻思想资源的是维特根斯坦，他前期主张图象论，说思想、语言与世界同构，思想是世界的图象；他后来

抛弃了此说，他的关键概念“游戏”和“规则”成了哲学话语最常见的主题和符码。

《从现代之根到后现代之茎》把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一截为二：从古希腊到尼采之前是现代性的“根”的哲学，之后产生了后现代的“茎”的哲学。前一种哲学具有归根究底的性质，它对事物的说明是追踪到第一原理，把现象归结为本质，从变化中找出不变的东西，抛弃语境和时间因素，这是一种基础主义。根的哲学预设了土地：理性与实在对应，语言忠实地描画实在这个大地的图景。根的哲学也是再现论哲学。作者认为，尼采、福柯、罗蒂等人使哲学重新回到它的真正主题，他们张扬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根本没有土地，即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符号的纯粹事实，语言本身就是自足的领域，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即语言网络之中，就像树的茎与土地无关，枝条互相支承缠绕一般。作者声明，揭穿了根的神化之后并不使我们陷入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而是嵌入对于社会和历史的理解之中，适合于这种理解的是解释学。

《从镜子到后历史》一文则从艺术表现手法的演进与电子传媒技术的扩展说明再现模式的破碎，一个指向后历史之路的技术时代正在来临。达·芬奇曾经断言：“画家的精神应该像一面镜子”，这句话预示了文艺复兴的开始。从那之后，各种印刷品、百科全书，直至今日的储存光盘，无不是一种镜子，把关于世界的知识尽收其中。而画家杜尚的作品以令人震惊的风格把现实之镜和古典模式打得粉碎，在当代，随着越来越发达的传媒征服世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书籍文明的抽象方式已经开始退位。电视的统治地位产生了一种媒体现实原则：第二手的幻影的非物质知觉取代了对于物体的直接的、第一手的物质知觉。在当今这个电子技术时代，再现系统已为一个超越现实的过程抛弃，这个技术运动正在重构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即重构整个社会。

《作为符号游戏的解构：~~西梅尔/德里达~~》^①以解构的方式阅读极端现代主义者西梅尔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德里达，即借助于他们的有关著述让他们相互游戏，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游戏在哲学话语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发现两位哲学家的相通之处。西梅尔的现代主义话语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照德里达的理解，这是指，坚持认为语言的意义有一个作为参照的对象。德里达是大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但他以书写为中心的语言游戏和西梅尔以生命为中心的社交游戏有相通之处。本文作者通过自己的解构式阅读，即对文本作强调和涂抹，得到了一个德里达式的西梅尔。

《艺术的规则：论康德和维特根斯坦》对两位大师的思想作了比较，并发现了重要的相似之处：康德把实践活动视为人类理性思维的基础，维氏则强调生活形式是不可超越的；康德把时间与空间当成人们整理感觉经验的框架，进行描述的先决条件，而维氏则把规则与语言的使用密切联系。作者想说明的是：不可能有美学规则，美学显示规则而不说明规则。

三、普遍性与差异

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人类既带着希望，又怀着困惑迎接 21 世纪时，人们发现，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思想文化的交流空前活跃，而民族传统的差异也愈益突出，甚至显得不可弥合。近年来，关于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与民族文化间差异性的问题成了热门话题，讨论和争议在两个层面上进行。

^① 对语言表达加横线是解构式的“删除”，表示它既被删除，又能够被阅读。

在学理层面，后现代主义（也包括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新左翼思潮）大力消解普遍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人类共同的价值，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理性、法律等等，不过是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的主流话语，是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扩张的工具。不少人认为普遍性是虚构的神话，差异才是真实的存在。当然，也有大量的人坚持人类有普适的价值，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有害的。

在实际的文化交流层面，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抗议声不绝于耳，他们不但与明目张胆的西方优越论者格格不入，而且既愤懑又痛苦地发现，那些申言尊重亚非拉文化，热衷于交流、学习、引介的人当中，不少人骨子里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和悲悯的心情去理解和同情弱势文化，实际上充满了自我中心的误解与歪曲。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第三世界的学者中有人针锋相对，以牙还牙；有人坚持开放和学习的态度，决心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有人力图在文明的普世性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本书所选三篇论文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但从中也可看出问题的重要和态度的歧异。

《比较哲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认为，所有的比较研究都同时含有同一性和差异性，但在实际上，比较研究意味着把西方社会和文化标准当成普遍标准，用来衡量其他的社会和文化，而非西方学者往往不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待西方文化，而是全盘接受西方标准。比如，除了西方哲学，是否还有印度、中国、伊斯兰、阿拉伯哲学，往往都成了问题。作者以自己熟悉的专业情况举例说，即使有不同国籍的人研究印度哲学，但讨论从来都是以欧洲语言进行，但概念术语的不可翻译性使得研究复杂并大成问题。作者认为，在观察、理解和评价另一种文化和传统时，任何文化或传统都不能拥有特权地位；普遍性的要求无法实现，

这不过是把西方模式暗中强加于人；比较研究的价值是找到差异性而不是寻找相似性，这样才能起到从自己传统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作用。

《伦理学的自然和哲学基础》细致地分析了自然主义伦理学和经验主义伦理学，认为用进化、欲望等等作为伦理基础都会走入死胡同，因为普遍理性原则是避免不了的。作者认为，必须沿着康德的思路，才有可能在理性基础上对价值理论作出阐述。当代重要哲学家阿佩尔、哈贝马斯、乔纳斯和罗尔斯明确而直接地继承康德遗产，就已经说明了问题。作者认为，任何文化都不能妄称可以靠自身实现普遍性，一个文化对普遍性的开放，是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碰撞实现的，是由交流与信息的全球化促成的。在目前南北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中，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发展与现代性有关的价值观，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等，尤其是批判意识，而西方人可以重新学会他们久违了的生活色彩的丰富性，调整枯燥无味和墨守成规的生活。

《我们将（始终）需要一个普遍性》的作者勇于正视这样一个难题：普遍性的理想和现实利益原则之间的差距，比如，全球化、世界主义的推行，不过是因为它们对大国、富国有利。作者表达了下列深刻的看法：普遍性不是一项静止不变的原则，而是那些接受者不断地重新挪用的原则，它是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一种互动的语言游戏。比如，不论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革命，在鼓吹公民平等时又维护奴隶制，但谁也不能说这两场革命不是鼓励人类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又如，自由贸易政策往往使富国获益最多，但其中包含的逻辑最终要应用于每一方，穷国也可以用自由市场的概念去对抗西方的保护主义。在教条的、抽象的世界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有中间道路，通过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张力可以充实起一种“具体环境世界主义”。

四、科学精神与技术理性

自 19 世纪起，西方工业社会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和罪恶，尤其是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历史悲剧，使不少思想家对于人类的前途产生了悲观主义。其中不少深刻的批判者把问题归咎于科学和技术。有人温和地批评人类未能控制住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使得对它们的应用向危害人类利益的方向发展；有人则激烈地谴责科学与技术在本性上就是异化的根源：它们脱离价值，它们导致机械、僵化，把一切转换成数字和程序。长期以来，制造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对立，攻击所谓的“技术理性”，成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时髦。

科学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科学的起源在何处？科学与技术本身应不应该为种种社会弊病，为政治与道德的堕落负责？有没有理由对人类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对以上种种问题作出与悲观主义者不同回答的哲学家，也大有人在。乐观和理性派中，有人证明科学的本质和精神与艺术的本质和精神并不对立，有人坚信，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会产生质的飞跃，从而解决科学技术产生的问题，包括消除对它们的误解。

20 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波普尔是乐观主义者，他不同意悲观主义者把道德和政治的堕落归咎于科学。在比较科学与艺术的异同时，他认为科学与诗歌同源，都来自神话。科学并不仅仅是收集事实，并在工业中利用这些事实，科学的起源可以在诗歌和宗教神话中，在人类试图解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幻想中找到。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创作的动力并非出于功利，他们受自己的想象、直觉和形式感的引导。波普尔一如既往地强调批评的进步作用：具有美学和文学意义的批评使神话变为诗歌，理

性的批评使神话变成自然科学；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相类似：从大胆的形象入手，依靠创造性批评把作品提高到未曾想到的高度。

对于技术理性的憎恶与诅咒，在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拉德那里有充分的表现，《从现实的技术爆聚中逃脱》一文对他的观点作了详细评析。他认为，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比上个世纪涂尔干和马克思揭示的异化更为深刻和可怕，因为技术理性已经延伸到人类存在的核心。“数字化”是罪恶之源：因为计算机化和信息处理的方式及要求使每一段输入都必须符合 $A=A$ 的清晰分类。作者的观点不像鲍德里拉德那么悲观，他认为语言的使用为逃离他所描述的单向度的、技术的世界铺平道路，同样是给予技术以权力的因素，也可以把人们从技术的魔力中解放出来，通过语言的使用，生活既可失之于技术又可得之于技术。

从 19 世纪末起，由于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失控和战争造成的悲剧，知识分子产生了幻灭感和悲观主义，《20 世纪的复兴？》一文的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对文化变革本质上缺乏精深知识造成的，而知识的缺乏同科学范式贫乏的现代世界观相联系。作者从当代的混沌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中受到启示，一种取代旧的牛顿范式，打破新达尔文主义的复杂的当代科学范式把社会视作一个自组织结构，描述信息的产生和进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社会模型，可以使人看清以前的破坏，摆脱现代认知地图强加给我们的异化，使我们有理由对 20 世纪的前景抱乐观的现实主义态度。

五、思想和语言

研究人的精神活动历来是哲学的重大课题之一，自笛卡尔以

来，对思想本性的关注——思想的起源、思想与身体的关系，等等——是近代认识论的中心问题，而在本世纪发生了所谓“语言的转向”后，思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了。

思想和语言的关系似乎是一望而知的，但要精确地加以界定却是一个难题。对于古典的认识论哲学家而言，不论是从个体还是群体发生学的角度看，好像可以断定先有意识、概念、思想，然后有表达它们的语言。当然，到了后来，两个方面几乎是密不可分的。但 20 世纪的一些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某些偏激的英美语言哲学家，主张思想就是语言，两方面不存在先与后、实质与表达、内容与容器这样的关系。照这种观点，无语言就无概念、无思想。本书收选的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能否有脱离语言的思想给出了不同的回答，第二篇还对心脑关系问题作出了新颖的阐明。

《失语症——一位哲学家病人和医疗机构的蠕虫眼视野》是一篇难得的经验研究和个案分析报告。作者是哲学家，在失语症恢复之后根据自己的体验驳斥了广泛流行的错误观点：概念除非和语言结合起来，否则不存在。决定性的区别是：失语症病人是重新学习语言还是重新想起和重新组织语言？医院治疗根据的原则是前者，作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失语症患者的思想上，语言、语法和句法的概念并没有变化。作者病愈后，继续在其他病人中作实验，他的发现是：失语症患者已经知道语言；他们通过重新构成语法、句法和音素重新获得语言；他们已经知道语言所代表的事物的含义，这就使得他们在语言之外还有概念。

关于精神起源问题，哲学界和科学界一种流行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精神的物质基础是大脑，精神是脑的结构与活动的功能。具体的论据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意识活动和大脑特定区域相关，切除或破坏大脑的某个部分，那部分精神活动就会丧失或受损。《为什么精神不存在于大脑中而存在于社会的联想主义结构

中》一文依靠引证大量的脑神经外科学、心理学实验报告和当代哲学文献，坚决反对定位论。作者认为精神不是可以定位的大脑产物，精神存在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交往中，存在于精神作为一种交往过程而流行的解释学循环中；所有的高级心理机能都是内化的社会关系，它们的整体性质是社会性的。

《思想的出现》主张，意识和思想不可分离，思想和语言不可分离；与语言同时出现的思想所特有的成分，将补充智力、发展智力并适当地把智力转化为思想；思想可以通过语言并在语言中考虑、澄清、概念化和研究，也就是作为思想被运用。文章还描述了作为社会形态的思想的历史演化，以及思想新类型出现的条件与过程。在古代，人类祖先形成了经验—理性—技术和符号—神话—巫术这两种并行不悖、各有其用的思想；在神权政治衰落和政治世俗化时出现了社会性思想，以及文学与哲学；后来从哲学中分化出科学思想。作者展望将出现把科学所关心的证实和哲学所关心的反思结合起来的思想。

六、历史哲学：客观性问题

历史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从上世纪中叶起，重要的历史哲学家不断涌现，如狄尔泰、克罗齐、科林伍德、汤因比等。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一些哲学家，如罗素、杜威、海德格尔、福柯、伽达默尔，其著述都直接与历史的题材有关。

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就像“世界是否客观存在，是否能为人所知”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一样。实际上，客观性问题对于历史哲学家更为紧迫，因为研究者几乎都不会与其研究对象有直接关系，而这个问题远远比认识论问题更要搅动人